



■彭啟原在楊梅老厝的照片，這間屋子有百年歷史，現已拆除。（圖片提供／彭啟原）

《新瓦屋再造》故事還沒講完

2009年12月初，客家紀錄片導演彭啟原來到國立交通大學，為客家文化學院的學生演講，分享他身為一個客家人和一個媒體人，如何在不同的期待中以冷靜、獨立思考的能力忠實呈現故事。

彭啟原說：「攝影機就像一把槍」，當初因為好奇進入竹林紙寮窩時，沒有想過這幽靜的小地方會在曝光後出現這麼多的問題。三年斷斷續續的拍攝期間，紙寮窩的老人家為了幫這個萍水相逢的導演，甚至在彭啟原不知道的情況下組織起來，重建「傳老亭」這個傳統造紙手工藝空間；研究紙料的學者相繼進入，紙寮窩的歷史該不該由博物館保存成了爭議；村里的年輕人以文化導覽、開發紙寮窩的觀光資源等，原本只是單純的紀錄，卻加速了社區營造，大大改變它的原始風貌。

《新瓦屋再造》算是最讓彭啟原傷腦筋的一部作品，當時因應高鐵計畫，六家新瓦屋在眾人的努力下雖然逃過被拆除的命運，成為客家文化保留區，可是這個過程是非常倉促且粗糙的。《新瓦屋再造》就是在觀察公部門如何將新瓦屋建成一個「活的」保留區。四年的拍攝，讓彭啟原來在政府與當地民眾之間，漸漸從觀察者變成介入者，也開始思考自己身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如何自我定位。彭啟原本來想要以這支影片讓新瓦屋聚落的居民回憶這個消失的家園，並讓新居者了解這個地方的歷史與文化。但是因應官方的要求，《新瓦屋再造》中許多民眾表達不同意見的畫面被彭啟原親手剪去。兩手各抓一支《新瓦屋再造》，彭啟原說，他真正想講的故事會保存下來，靜靜等待可以發表的那一天。（王俐文）

彭啟原 傾心血用影像記錄客家文史

他說，他很樂意帶領史地相關科系的學生，用影像記錄歷史甚至寫論文，因為人文素養能夠更深切地詮釋影像。



文／王俐文

一縷白煙裊裊而升，客家紀錄片導演彭啟原將一壺熱呼呼的東方美人茶倒入杯中。彭啟原解釋他不喝酒，所以茶點就是他平常會友人的飲料。這間小小的工作室整理成兩半，一邊擺放設著名茶具的矮桌和藤椅，給溫軟的木頭色調輕圍繞；另一頭的牆壁則是井然有序的資料，和堆著疊疊文件的電腦桌宣告著主人的細心。

苦讀之外 找到一個新奇世界

彭啟原是桃園楊梅的客家人，父母親、祖父母和兄弟姊妹都會講流利的客語。指著牆壁上老家的照片，彭啟原說，當時能住這樣的房子還算優渥，所以小時候對於客家人並沒有所謂「刻苦耐勞」的感覺，對於客家人的刻板印象，多是長大後才聽說的。但是這種「很不客家」的記憶在彭啟原16歲時因為父親過世而斷裂，雖然家裡還有一些積蓄，但獨力撫養兒女的母親頗感壓力，自然會對兒女有更高的期待。然而，生前喜愛攝影的父親留下了一台相機，讓從小對影像有興趣的彭啟原在苦讀以外，找到了一個新奇的世界。

新竹中學在六零年代的校長是倡導全方位學風的辛志平，他不畏升學的潮流，鼓勵學生各項能力的培養，一時之間竹中的格局宛若大學。順著這股風氣，彭啟原住宿學校時瞞著母親，把那台舊相機帶到學校並加入攝影社。說到這裡，彭啟原不好意思地搔搔頭，因為當時不喜歡念書，甚至還瘋攝影玩到被留級一年；幸好最後考上文化大學影劇系，媽媽還高興地送給他一台全新的相機。彭啟原認真地說，這個經驗讓他懂得給兒女一些選擇的空間，不斤斤計較孩子的成績，所以他也不要要求師大附中畢業的兒子念所謂的名校，讓他依興趣就讀實踐大學平面媒體設計研究所。

大學四年 全靠自修累積攝影功力

自從高中迷上攝影以後，彭啟原就堅信做影像是他這一生的志願，但是當年相關資源匱乏，學習管道和出路都不是很好，連高中時攝影社的指導老師也是喜愛攝影的化學老師兼職。其實彭啟



■客家紀錄片導演彭啟原精力充沛，講到自己最愛的影像就手舞足蹈。（攝影／王俐文）

原文化大學影劇系也是有點糊裡糊塗，一方面因為成績的束縛進不了最理想的新聞系，一方面看到「影」這個充滿吸引力的字，就誤以為影劇系會接觸很多影像。就讀後他才發現，文化影劇系的資源、設備不好，而且對於影像的涉獵不比舞台劇，一天到晚「To be or not to be」地排練莎士比亞作品；所以大學四年的攝影技術，除了比較專業的film（底片）概念，幾乎都是彭啟原靠經驗和練習累積出來的。講到興奮處，彭啟原從藤椅跳起來，從架上翻出一本又一本的舊相簿，裡面全是年輕時用功的結晶。

看著從前爸爸和自己拍的相片，彭啟原講起當年接觸攝影的點點滴滴。古早的器材笨重，所以那個年頭的攝影師都很健壯。除了硬體的不便，當時的剪接術也很麻煩，剪錯又要從頭弄一次，常讓彭啟原有「To be or not to be」的掙扎，但結果往往只能懊悔撞牆，然後咬牙再啟一次。「現在數位化後，喜歡攝影的人真的很幸運。」退伍後的彭啟原面臨器物與技術的革新，從前

的化學性質的底片改成了物理性質的磁帶。身為台灣少數從ENG（electric news gathering，早期的DV）年代做到現在數位化設備的行家，彭啟原對於廉價輕便的器材卻沒有安全感，就連近幾年的紀錄片作品也是用傳統的磁帶拍攝。不過美學的概念、內容的意義是不會消失的。聊到最拿手的影像，彭啟原有些得意，「我應該去大傳系開個講座，叫做『傳播歷史』，哈哈。」

做紀錄片 感受影像生命力

彭啟原最初以拍攝結婚錄影為業，「很累但是好賺」。當時一部影片就可獲利8000元，彭啟原擔任攝影、扛器材、打燈光的兩個搭檔做了幾年，成果還算豐碩。民國七十年初業界流行受託拍攝工商簡章給經銷商看，一部10分鐘的影片大概就有100萬的收入，可是彭啟原卻覺得少了些甚麼。「因為對於影像有興趣，我就會care拍攝出來的影像有沒有生命力。可是工商簡章是非常沒有生命的，老闆要甚麼我就拍甚麼，拍到後來

很煩。結婚錄影還比較好玩、比較有生命力。」在甚麼樣的巧合，彭啟原踏入了客家紀錄片的領域呢？彭啟原表示，那個年頭根本沒有紀錄片這個名詞，只是因為對於影像的熱忱，他捉住了廣電基金（現在的公視頻道）給予的機會。當時在製作文化景點導覽的影片，有一個叫做「鄉聲曲韻」的主題，要結集中國各族像是閩、客、陝西等文化的傳統歌謠，彭啟原就這樣通過徵選，負責「客家風情畫」這個節目。「山歌放出來的時候有風景，還有旁白。這個就有趣多啦，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鏡頭，蠻好玩的。」彭啟原又翻箱倒櫃，秀出一本泛黃的逐字稿，密密麻麻的筆記滿溢表格外。開始在自己的影像中感受到生命力，彭啟原就和同事腦力激盪，選了十幾個客家文化的題材擬成一份企畫書，興致勃勃地送到廣電基金，自此他就投身客家紀錄片的製作。

每開啓一個話題，彭啟原就從工作室的各個角落挖出自己的經驗，慷慨地秀出來。電腦桌已被成堆的資料淹沒，彭啟原卻未顯疲憊。一聽到問題，一嗅到不解的氣氛，馬上又一躍而起，把整櫃的回憶傾倒出來，或許就是這股幹勁和的動快，彭啟原才能在影像世界投注畢生心血吧。

帶領學生 擔任工作坊講師

彭啟原最近在帶領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的學生用影像記錄文史。問及教學經驗，彭啟原謙稱自己不過是個學士，嚴格來說沒有教師的資格。多年前中央大學客家學院曾請他去修碩士學位，順便兼任教師。但彭啟原調皮地說：「那邊一堂課給800塊，一個禮拜也只四節課，我一場演講就3000多塊了，划不來哈哈！」但他後來還是應邀擔任紀錄片工作坊的講師。

「帶那十堂課還蠻輝煌的，我們還參加客家電視台《1394打戲路》的紀錄片比賽。」彭啟原表示，他不太可能進入學術的運作，除非學校願意打破傳統的觀念，例如用沒有學分的方式辦講座或是工作坊。他說，他很樂意帶領史地相關科系的學生，用影像記錄歷史甚至寫論文，因為人文素養能夠更深切地詮釋影像。彭啟原說，這樣的經歷讓他覺得有責任寫一本關於影像史學的書，讓學子和後世對於台灣影像的發展史有所感動。

劉京定 難忘「賠錢貨」vs「香爐耳」夢魘

因為家中女生很多，總是被親戚冷嘲熱諷「賠錢貨」，而且她的奶奶常把弟弟是「香爐耳」掛在嘴邊，讓她們做姊姊的聽了很刺耳。

文／戴子嘉

劉京定，任職於中央警察大學，擔任學生總隊研究生中隊的區隊長。她自認為是非典型的客家人，因為高中以後就離開客家莊，偶爾才會回老家看看，不過在她的身上仍留有客家人的氣息。

劉京定家中總共有七個小孩，她排行第五，上面有四個姐姐，下面有兩個弟弟，從她的家庭結構來看，就可以知道她們家有非常嚴重的重男輕女觀念，加上她的父親是長子，無論如何都要將「香火」延續下去，因此小孩一年增加一個，生到第六個終於是個男生，總算達成了傳宗接代的任務，基於中國人的「多一個小孩只是多一副碗筷的觀念」，在她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排行第七的小弟也來報到了。

父母教育 小孩「團進團出」

由於父親是長子、長孫，從小便和奶奶同住，難免會受到傳統重男輕女觀念的影響，但是生長在物質缺乏的年代，觀念上的重男輕女，其實在物質上的差異並不大，而且光靠她的父母親照顧一家十口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所以她們五姊妹從小就扛起重大的家務事，同時還要照顧年幼的弟弟，她還提到因為家中女生很多，總是被親戚冷嘲熱諷「賠錢貨」，而且她的奶奶常把弟弟是「香爐耳」掛在嘴邊，讓她們做姊姊的聽了很刺耳，「明明同是客家人，為什麼會有如此的差別待遇？」所以她有時會頂嘴說弟弟是「尿桶耳」，小小的發洩一番。

生長在家庭即工廠的時代，劉京定的父母原本經營腳踏車店，後來跨足到金香業，家中的經濟才略有改善，不過那時還是小孩子的她們就開始了打工的生活。在她的印象中，小時候沒有寒暑假，也沒有所謂的週末，過去的週六要上半天課，一放學回到家吃完午飯後，母親就會用摩托車一趟趟地帶她們往自家工廠，從事需要人力的半成品加工工作，每每在規定的份量完成後才能玩耍，男女皆然。而且有時週末下課後，她們還要協助急件的完成，所以小的時候，她們最怕放假。但長大後她的母親卻有另一種說詞，她說因為家中小孩太多，每天下班回到家後都會聽到

奶奶抱怨她們不乖，又怕她們出去跟不良少年混在一起玩，所以她的母親認為整隊小孩「團進團出」，比較好管理，而且她很得意的表示：「根據我的觀察，這招似乎真的有效！」

重視讀書 父母身教影響最深

因為劉京定的父母教育程度都不高，深深體會到未受教育的痛苦，所以非常重視子女的教育。儘管家中孩子很多，但是只要跟念書有關的花費，父母親絕對二話不說爽快掏錢，所以她常常用買文具的藉口騙取零用錢，說到這裡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不過她很驕傲地表示，從小學開始都是靠自己讀書，就是遵循鐵律——新聞播報完畢就得關閉電視，所以每次月考平均都有九十五分呢！

除此之外，劉京定覺得受父母影響最深的就是身教，她說父母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入睡時已經是凌晨，尤其是她的母親，早上四、五點就得起床洗衣、養雞、餵豬，還得幫全家人準備早餐；她的父親是典型的客家男人，地位崇高，母親總是規定晚餐一定要等到父親回家後才能開動，印象中還會經常等到晚上九點。劉京定覺得母親為了家庭，再辛苦也值得，所以她小時候唸書唸到累的時候，常常會提醒自己：「父母很辛苦，不要讓別人看不起我們這些女兒！」

劉京定還記得當她的三姐高商畢業後，父母出錢讓她補習考二專，左鄰右舍親戚議論紛紛：「女兒是賠錢貨，養大了還不是別人的，念這麼多書幹嘛？」在她的三姐考上台北商專後，親戚又說的話了：「書念這麼多，錢有賺比較多嗎？」後來她的四姐高工畢業，也去補習，考進了新埔工專二專部，親戚再補上一句：「他們家的小孩唸書都是用錢堆出來的」，令她忿忿不平。深陷客家莊重男輕女的傳統思維，讓劉京定在成長過程中不斷地形成她的夢魘。

學運時代 確曾遭受差別待遇

她回想求學過程中，確曾因為是客家人而遭受差別待遇，還記得在野百合學運時代，在一次的演講場合中，聽眾要求演講者以閩南語發音，當時她也很想站起來表示：「台灣不是只有閩南



■在丈夫和可愛女兒的包圍下，劉京定露出幸福的微笑。（翻拍照片）

人，還有客家人、原住民，台灣省不是叫做福建省！」可惜當下她沒有這種道德勇氣，令她頗為懊惱。所幸在現代，這種景象已不復見。

從小生長在竹東客家莊的劉京定，平常以說客家話為主，一直到了新竹念書後才體認到講客家話的重要性，因為到了新竹女中，才發現原來新竹市大多是閩南人，客家人很少。她說以前住在

竹東時，鄰居、同學、老師都是客家人，體會不出客家人是少數族群，到了新竹女中才發現情況已經變了。同時她還發現自己講國語時，客家口音還挺重的，於是努力去除說話時的客家口音。不過由於客家話在學校是稀有語言，劉京定開玩笑地說，如果要罵同學又不想被聽到時，客家話就可以派上用場了，所以到了新竹才讓她深刻感



■擁有兩個可愛女兒的劉京定，是個稱職的母親。（戴子嘉攝）

受到「我是客家人」。另外，有些閩南籍同學很喜歡指出她的客家口音，甚至笑她說話的腔調，有種被歧視的感覺，於是她開始刻意地隱藏客家口音。而她有點不好意思又得意地提到，因為客家話有六種聲調，北京話只有四種，所以她現在可以把國語說得很標準，英文發音也很流暢，都是拜客家話的六種聲調所賜。

不會講客家話「So what?」

當客家人與閩南人結合，劉京定發現了很多有趣的差異，根據她從先生身上觀察到的閩南文化，她覺得閩南人好像比較喜歡吃魚，而客家人比較喜歡吃肉，可能和大部分客家人居住在比較接近山區有關，魚對他們來說比較貴也吃不起，以她們家為例子，內的料理變化顯然比魚多出許多。還有客家人很喜歡吃米食，也喜歡一次做很多份送親友，然而有趣的是，傳統客家女性其實很不屑閩南的米食。她還強調客家人覺得閩南人的腔調很重，如果親戚中有人娶閩南人為妻的話，大家都會在背後稱她

為「閩南婆」，其實這句話是罵人的，因為以前客家人人的外遇對象都會被叫做「閩南婆」，所以這個稱呼其實蠻負面的。

很多人都說台灣人非常熱情、好客，劉京定眼中的客家人也不例外，「客家人非常大方！」她很興奮地說，很多路過家中的親戚，如果剛好碰到他們家的用餐時間，都會被邀請進來一起大快朵頤一番，和一般人存有對客家人吝嗇的觀念很不一樣。

劉京定表示，雖然近幾年來政府開始重視客家議題，但是政府機關對客家人的照顧，或者是

在推廣客家文化上的努力，就她的感受來說仍然不夠。至於「現在常不常講客家話？」，她覺得因為隱形客家身份太久了，因此不太會在公眾場合說客家話，所以她覺得年輕一代的客家人已經沒有學習客家話的動機了。「母語傳承的重要性，其實連我都不懂」。她差聲表示，如果小孩會講客家話當然是最好不過，但不會講客家話好像也沒有太大影響，畢竟台灣的客家族群還是占少數，雖然她知道要教，但是並不積極，再加上她嫁給閩南人，已經不住在客家莊，對她來說在家要以客家話交談，真的有些困難，所以不會講客家話「So what?」她覺得客家話可能逃不了式微的危機。（戴子嘉）